

是负面的评价，信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以自我为中心，追求刺激和感性欲望的满足。它对待一切事物都没有严肃的态度，万物娱乐化是它的宗旨。第三，政治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它主要是一些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西方敌对势力或他们资助的国内相关利益群体，出于颜色革命和颠覆我国政权的目的，抹黑中国革命的英雄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针对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同情况，各方唯有精准施策和综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其泛化和危害。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

三 文化国际主义：中国文化通达 世界文明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郭树勇

文化国际主义强调国际文化合作的深化和文化秩序的重建，既有国际文化合作的普遍性，又有中国文治天下传统和国际主义使命的特殊性，因此，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重要理论主张。文化国际主义的三个层次：一是全球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全球主义，其主要依靠力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七国集团、金砖国家、七十七国集团或二十国集团等综合性全球治理协调机制的人文交流活动。二是区域层面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区域主义，其生成的规律主要分布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文化合作，另一方面是区域间文化战略的对接与合作，有时我们称之为区域文化战略竞合，其实质就是不同的区域之间而不仅仅是不同的国家之间，也有文化上的合作。三是个体层面的对外文化合作，可以称之为文化开放主义，其核心是有关国家在维护文化主权的前提下，进行面向世界的文化改革，加大对外的文化开放。这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文化国际主义的概念。中国坚持文化国际主义有着包容多元文化等传统优势，也有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消极影响、文化民族主义的潜在威胁、文化接续与文化现代化底气不足等不利因素。为了培育文化国际主义，除了继续向国际社会提出重要的价值文明体系变革和文明对话等国际倡议外，有必要加强区域文化合作，加强民族文化改革和对外文化开放。

(摘自《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期)

四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文化自信的建构与诠释

马振江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精神特质的总体性判断，是在综合人类先进文明和反思自身文明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是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自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与实践性特征。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不是一个抽象概念或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一

个富有意识形态以及时代性、实践性内涵的价值导向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信仰与认同的问题，也不是无条件服从、信仰以西方为代表的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人类文明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逻辑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融会贯通，是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内在文化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文化选择、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必然要在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三重逻辑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和基本理论进行理性认识和自觉建构。新时代的文化自信需要落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以及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治国理政的优越感，来实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好诠释。

(摘自《探索》2019年第2期)

五 运用唯物史观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吴文新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通过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神经网络及其细微末梢来感知和调控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一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社会存在，特别是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从根本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二是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及各种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不断强化巩固、做大做强做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着力巩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源头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三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赢得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从主体上铸造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铜墙铁壁；四是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一代又一代青年怀有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战略上建设一支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生力军；五是提高对外开放质量，我们要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过程中，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主导权、主控权，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视野，在国际关系领域筑牢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攻击的“防盗门”。

(摘自《人民论坛》2019年第26期)

六 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的表征、成因与特质

陈金龙

文化自信是主体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发展道路、发展取向、发展前